



# 共生视域下公众参与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的 作用机制与路径

王恬

**摘要:**基于共生视角分析公众参与和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资源配置视角、嵌入视角和需求视角分析公众参与对社区治理能力的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公众参与可以从公共服务配置、党组织基层治理能力和公众社区安全感三个方面有效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原因在于公众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可以通过沟通降低政府和公众信息不对称、通过互动提升基层党组织公信力、通过共治维护社区共同利益需求。应通过制度构建、文化培育和技术赋能促进公众参与社区治理,提升社区治理能力。

**关键词:**共生;公众参与;社区治理能力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3.0408

**收稿日期:**2022-03-2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城乡社区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及测度研究”(SC22TJ07)、四川省科学技术厅软科学项目“智慧赋能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研究”(23RKX0642)、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成都实践及探索研究”(2022CZ145)、四川师范大学校级项目“党外干部在推进城市基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研究”(22XW09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恬,女,四川成都人,经济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社会经济学与社会治理,E-mail: wangtian@sicnu.edu.cn。

## 一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sup>①</sup>。社区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随着国家治理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政府“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需进一步和社区“自下而上”的民主参与有机结合,以提升治理效能。

“以人民为中心”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sup>②</sup>。治理本质上是政府、市场、社会主体之间的合作共治,即参与者各安其位、各司其职<sup>③</sup>,这种“治理共同体”的联合内含共生哲学。共生(symbiosis)原指人们如何实现一种共同生活<sup>④</sup>。胡守钧认为个体、群体、组织之间普遍存在由于利益互斥性导致的冲突,社会共生正是主体为了生存寻求合作<sup>⑤</sup>。正是由于公众的相互参与和交往实践形塑了社区的“共同体”特性。费孝通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7、54页。

② 夏志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第5页。

③ 高名姿、张雷、陈东平《差序治理、熟人社会与农地确权矛盾化解——基于江苏省695份调查问卷和典型案例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15年第6期,第60页。

④ 高宣扬《德国哲学通史》,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9页。

⑤ 胡守钧《社会共生论》,《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第1期,第20页。

将社区的“共同体”特性形容为成员有共同的感受、有共同关心的事情和共同的命运<sup>①</sup>。公众作为国家现代化共享发展的核心主体,应与政府、市场和其他社会力量协同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sup>②</sup>。公众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蕴含“共生”逻辑,实现多元主体良性互利共生走向基层“共治”,是我国社会治理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确保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促进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sup>③</sup>,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sup>④</sup>。

已有研究认为,公共服务供求结构失衡是单一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下的供求错位<sup>⑤</sup>,导致公共服务无法满足居民日趋多元的需求,也让政府陷入财政负担和庞杂事务中难以自拔。社区公共服务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社区自治水平,公众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能显著提高社区协调公共服务的能力。一方面,治理主体的全面性可以优化公共物品供给和配置<sup>⑥</sup>,提升社区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另一方面,公众参与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sup>⑦</sup>,可以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进一步激励公众作为社会力量担任社区志愿者,调动社会慈善资源,组建居民社会组织,提升社区自主治理能力。然而,在实践层面,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程度不足仍然是社区治理的困境。公众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具有准公共物品特点,集体主义困境是激励和推动公众参与社区治理面临的一大难题<sup>⑧</sup>。本文基于共生视域揭示公众参与和社区治理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资源配置视角、嵌入视角和需求视角研究公众参与对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的机制,探究促进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

## 二 文献回顾与理论机理

### (一)文献回顾

公众参与是公众在决定公共事务时,就相关重大问题获取信息,并通过反馈互动对相关行政立法和公共决策的制定产生影响的过程<sup>⑨</sup>。社区治理是公众与社区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社区治理能力可以理解为社区治理的不同参与主体通过相互交往改变治理结构,解决社区问题,推进资源有效利用,在共治行动中形成的实现公共利益的总能力<sup>⑩</sup>。

治理理论认为,公众参与有助于社区治理能力的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的衡量依据研究视角和治理目标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学界对社区治理能力的衡量主要包括以下视角。第一,资源配置视角。研究者们认为公众公共服务满意度反映了政府和社区的公共资源配置能力、社区治理绩效以及公众享有城镇化发展成果的程度和水平。因此,公众对公共物品的满意程度可以衡量社区治理能力<sup>⑪</sup>,反映政府客观绩效<sup>⑫</sup>。如 Theodori 认为,社区公众满意度可以在客观上衡量社会现状、反映公众的主观期望<sup>⑬</sup>;Yusuf 和 Saich 基于顾客满意理论,将公众视为公共服务的消费者,构建公众公共服务满意度<sup>⑭</sup>。第二,嵌入视角。主张政府与公众

① 费孝通《居民自治: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目标》,《江海学刊》2002年第3期,第15页。

② 张喜红《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中的共享发展——时代内涵、多维逻辑与有效路径》,《社会科学研究》2020年第4期,第31页。

③ 尹婧文《国外智慧城市建设中市民参与实践启示——以英国智慧城市项目DPHC为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第111页。

④ 高奇琦《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何以发生——一种新结构政治学的分析》,《社会科学研究》2020年第5期,第1页。

⑤ 林万龙《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求的结构性失衡:表现及成因》,《管理世界》2007年第9期,第62页。

⑥ 刘方亮《推进治理进程中应当把握和处理好的几个关系》,《社会科学研究》2020年第1期,第64页。

⑦ 罗文纯、陈怡然《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研究综述》,《中国农村观察》2015年第6期,第89页。

⑧ 付诚、王一《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对策》,《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1期,第207页。

⑨ 贾西津《中国公民参与:案例与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⑩ 孙锋、王峰《城市社区治理能力:分析框架与产生过程》,《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2期,第53页。

⑪ 王杨《党建引领结构与社会治理绩效实证研究——基于网络视角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6期,第74页;孙小逸、黄荣贵《制度能力与治理绩效——以上海社区为例》,《公共管理学报》2012年第4期,第29页。

⑫ 李文彬、沈涵、李雅婷《客观绩效、信任度与公众满意度——基于调查—实验法的探索》,《公共行政评论》2019年第4期,第27页。

⑬ Gene L. Theodori, "Levels of Analysis and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in Community Attachment and Satisfaction Research: Connections to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of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Society* 31, no. 1 (December 2009): 35-58.

⑭ Shahid Yusuf, Tony Saich, *China urbanizes: consequences,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08), 193.

应团结互动,消除利益上的对立,着重考察基层党组织和其他社会治理主体的共生关系<sup>①</sup>。因此,公众对党组织的信任和认同度,体现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能力,也是一种社区治理能力<sup>②</sup>。第三,需求视角。马斯洛心理学理论认为,心理安全感是从恐惧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是公众最为基础的需求<sup>③</sup>。社会公众安全感是安全感的主要表现之一。社区作为公众日常生活的起点,是公众最为熟悉的日常生活环境。作为公众最切身的利益需求,社区公众安全感也是治理成效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sup>④</sup>。陈宇琳等在分析公众参与对社区治理效果时,以居民安全感作为治理效果的代理指标<sup>⑤</sup>。

总的来看,目前学界对公众参与和政府公共服务效率展开了规范论证和经验研究。学界已经意识到公众参与对社区治理的重要性。公众通过沟通和协商调和个体差异化观念,形成共识自主解决基层问题。公众参与能降低治理成本,提高社区民主效能<sup>⑥</sup>,校正公共服务供给环节,改善公共服务<sup>⑦</sup>,提高公众对社区生活的满意度<sup>⑧</sup>。社区作为公众生活的起点和国家资源下沉的承接点,良好的社区治理关系能提升基层资源配置效率和公众幸福感,应深入探讨公众参与对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的的作用。同时,社区治理能力作为社区“共生”主体的公共利益之和,从政府资源配置、基层组织嵌入和公众需求视角进行微观层面的研究,能更好体现社区治理中政府、社区和公众之间相生相伴的“共同体”关系。鉴于此,本文结合数据分析和访谈案例,探索公众参与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的经验理论。

## (二)共生视域下公众参与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的理论机理

物质生活品质的提升激发了公众对公共物品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sup>⑨</sup>。政府作为公共物品的单一供给主体,最优公共物品配置建立在政府对公众需求偏好的清晰认识之上。然而,政府供给和公众需求存在信息不对称,尽管布坎南认为全体成员达成一致可以实现帕累托效率最大化,但是集体达成一致的决策成本高昂<sup>⑩</sup>,因此,政府大多选择发包制式的公共物品供给,资源配置的精准度随之下降。

中国的公共物品配置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为了提高公共物品的精准配置,在国家治理体系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变迁的过程中,城乡基层治理也历经了从“政府主导”、“共同治理”到“治理共同体”的演变。“治理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话语,强调多元治理主体形成“互惠共生、合作共治”的共同体,共同建设基层治理结构,完善基层治理制度,共享基层治理成果<sup>⑪</sup>。政府与公众能否达成“共在共生、互依互存”的互构关系是提升国家基层治理效能的关键<sup>⑫</sup>。在中国式社会治理中,政府已不再是社会资源配置的唯一主体,公众参与社区治理是代表自身利益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集体选择的过程,公众、社区和政府形成互利共生关系。公众通过参与社区治理实现了从公共物品消费者到公共物品供给者的角色转变。完善的公众参与社区治理机制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格局,提升公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公众参与社区治理对于深入推进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三 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的基础:公众参与的作用

①徐选国、徐永祥《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三社联动”:内涵、机制及其实践逻辑——基于深圳市H社区的探索》,《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第87页。

②叶继红《农转居社区治理能力:维度、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中州学刊》2021年第2期,第62页。

③A. H. Maslow et al., "A Clinically Derived Test for Measuring Psychological Security-Insecurity," *The 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 33, no.1 (November 1945): 21-41.

④刘晓霞等《地理学的安全感研究:基于地点的综合理解、应用及展望》,《人文地理》2018年第5期,第38页;谌丽等《居民城市公共安全感知与社区环境——基于北京大规模调查问卷的分析》,《地理学报》2021年第8期,第1939页。

⑤陈宇琳、赵娟《城市治理线上公众参与效果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公意—众意的分析视角》,《城市发展研究》2021年第8期,第107页。

⑥张力伟、李璎璐《“三全合一”: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作模式及其内在机理——基于Q社区的实践分析》,《探索》2022年第6期,第65页。

⑦张廷君《城市公共服务政务平台公众参与行为及效果——基于福州市便民呼叫中心案例的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15年第2期,第28页。

⑧Andrea Vega-Tinoco, Ana Isabel Gil-Lacruz, Marta Gil-Lacruz, "Civic Participation as a Promoter of Well-Being: Comparative Analysis among European Countrie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64, no.1 (June 2022):217-237.

⑨Samuel Bowles, Herbert Gintis, "Soci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The Economic Journal* 112, no. 483 (November 2022): 419-436.

⑩詹姆斯·M.布坎南《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马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版,第85页。

⑪周进萍《从“共同治理”到“治理共同体”:基层社会治理实践逻辑转换》,《重庆社会科学》2022年第10期,第97页。

⑫孔令英、陈思羽《互惠共生:政府与农民互构式治理机制》,《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第114页。



### (一) 公众参与对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的作用维度

挖掘公众参与对社区治理能力提升存在或潜在的积极作用是激励公众参与的首要环节。本文依据“三角互证”进行研究设计,采取描述性统计分析和质性访谈法,探讨公众参与促进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的维度。描述性统计分析数据源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2017 年数据,参考杨菊华的做法保留样本个数大于 5 的社区样本点,共有 1305 个社区的 10140 个样本<sup>①</sup>。质性研究选取具有一定人口规模和人口异质性的城市社区,笔者选择了江苏省 N 市 YZ 社区回溯性探究公众参与对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的作用机制,并于 2017 年 10 月进行田野研究,通过观察、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完成质性访谈资料收集。

基于资源配置视角,研究者认为社区公众公共服务满意度是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感知绩效和预期期望进行比较的结果。本文参考 Bernard 做法,基于居民对社区生活诸多社会因素的总体评价衡量公众公共服务满意度<sup>②</sup>。通过社区公众对公共教育服务、劳动就业创业服务、社会保险、医疗卫生服务、社会服务<sup>③</sup>以及住房保障服务满意程度构建社区公众公共服务满意度指标。按照李克特 5 点量表法予以赋值,6 项指标的 Cronbach 的  $\alpha$  信度系数为 0.86, Bartlett 球形检验  $p$  值为 0, KMO 统计量为 0.92,说明数据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公众公共服务满意度指标衡量社区治理能力。按照三分位点,本文将社区治理能力分为低、中等、高社区治理能力。数据显示,在低社区治理能力样本中,仅有 32.88% 的公众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在中等社区治理能力样本中,这一比例上升至 43.01%;而在高社区治理能力样本中,有 48.69% 的公众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可见,随着公众参与比例的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也在提高。

嵌入视角的研究强调基层党组织嵌入在社区治理主体的基础上,组织并激励包括社区公众在内的多方主体参与社区“共治”。通过枢纽链接、组织嵌入与行为垂范等方式重塑社区基层党组织与社区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通过良好的社区治理获取社区公众信赖和情感认同<sup>④</sup>。因此,基于嵌入视角,公众对基层党组织和社区的信任及认同可以衡量社区治理能力。本文选取公众对社区民主选举的满意度衡量公众对基层党组织的信任;选取公众在发生纠纷时是否向社区求助衡量公众对社区的情感认同。数据表明,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公众对社区民主选举感到非常满意的比例为 32.81%,不参与的公众感到非常满意的比例为 16.77%;62.18% 的参与群体在发生纠纷时会向社区求助,这一指标在不参与群体中为 49.68% (见表 1)。这一结果表明,公众参与加强了公众对社区的信任和认同。

表 1 嵌入和需求视角下公众参与对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的作用

作用维度 公众参与	对社区民主选举感到非常满意	发生纠纷会向社区求助	认为社区非常安全
参与	32.81%	62.18%	32.51%
不参与	16.77%	49.68%	24.38%

基于需求视角,研究者将社区公众安全感作为社区治理能力的衡量标准。本文参考申探明和王燕对社区安全感的测量方式,选取公众主观安全感知衡量社区治理能力<sup>⑤</sup>。表 1 分别列出了参与和不参与群体认为社区非常安全的比例。结果表明,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公众认为社区非常安全的占比为 32.51%,不参与的公众认为社区非常安全的比例为 24.38%,说明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可以提升公众主观安全感。

### (二) 公众参与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的机制

前文的分析表明,在资源配置、嵌入和需求视角下,公众参与对社区治理能力提升均有积极作用。本部分将通过半结构访谈,回溯性追踪社区和公众的社会互动事件,探究公众参与对社区治理能力的机制。

①杨菊华《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 2 期,第 70 页。

②Josef Bernard, “Community Satisfaction in Czech Rural Communities: A Multilevel Model,” *Sociologia Ruralis* 55, no. 2 (November 2015): 205-226.

③2017 年 CHFS 问卷将社会服务定义为:“当地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医疗救助、各自临时救助、留守儿童及困境儿童关爱保护、退役军人安置、各种优待抚恤服务”。

④孟燕、方雷《动员型治理: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内在机理与实现机制》,《探索》2022 年第 6 期,第 85 页。

⑤申探明、王燕《个体特征、收入水平与治安风险感知的性别差异——基于 460 个社区的实证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22 年第 1 期,第 138 页。

### 1. 沟通降低政府和公众信息不对称

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在决定社区公共物品的类型、质量和数量时,获得公众对公共物品的偏好可以优化公共资源供给和配置方案。因此,沟通可以降低政府和公众的信息不对称。YZ社区成立了社区沟通机制,通过发动积极分子担任志愿者,构建社区和公众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向信息传递机制。其中,微信群和QQ群在信息传导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除了日常事务链式信息传递之外,社区联络员也会在业主微信和QQ群中直接与公众沟通。

我们社区在每个小区成立了楼长、楼栋长和幸福希望联络员等居民志愿者岗位。通过社区一楼栋长一楼长一公众进行信息传递。楼长和楼栋长需要负责向本楼居民传达社区事务,或者动员本楼居民参与社区活动。幸福希望联络员负责定期询问单元内老年人的生活近况或需求,并向社区反馈。社区每半年会召开集体会议集中了解情况。(YZ社区居民,楼长,P101Y)<sup>①</sup>

公众参与向社区表达利益诉求可以减少基层社区和公众之间的信息壁垒。因此,激励公众向社区表达社区成员对于公共物品的真实偏好和需求,是控制决策成本并减少公共资源错位配置的前提。

### 2. 互动提升基层党组织公信力

嵌入理论认为,行动者嵌入在关系网络之中,多主体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可以实现关系性融入。笔者考察发现,社区积极分子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有助于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例如,社区鼓励党员群体担任社区会客厅的志愿接待人员,实现社区公众和社区工作人员的身份重叠。一方面,党员通过这种短期角色换位嵌入到社区基层工作,通过公众对社区的监督作用,提高了基层党组织的执政透明度,也能将参与之后形成的情感认同传递至社区其他公众。另一方面,作为社区共同生活一分子的党员在处理来访者诉求时,“邻居”身份可以拉近和来访者的距离。

我们社区建立了“365党员会客厅”制度。由党员担任社区办公室会客厅的接待人员,了解来访居民的需求并反馈给社区。一共召集了31位党员,保证每天都有党员在岗。让党员参与到社区日常工作中,让大家了解我们、监督我们,然后再向社区普通群众进行宣传;党员的加入可以实现我们和居民零距离沟通,更好地为居民提供需求传递渠道,让社区和上级政府更好地了解居民的真实想法。(YZ社区党委书记,L101Y)

### 3. 共治维护社区共同利益需求

需求理论认为,个体行为决策会受到自身需求的影响。因此,公众参与决策会受到自身社区安全感需求或精神追求的影响。YZ社区中的社区治安巡逻队,是在公众寻求社区力量满足社区共同生活需求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公众需求推动和社区统一组织下产生的共治行为。其中,共同的社区安全感需求满足和公共精神需求满足是社区公众形成的主要共同利益诉求。其一,共同的社区安全需求。由于城镇化下人口流动性增强、人口异质性程度增加、家庭规模缩减以及城市社区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社区公众共同面临着安全感下降的问题。为了共同的社区安全需求,社区公众自发组织并在社区指导下形成公益类组织,该类组织在维护社区治安、纾解邻里冲突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二,共同的精神需求。一些离退休群体表示,闲居在家的日子比较单调,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活动极大地丰富了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如果自身的志愿参与能有益于社区和社会,参与这类事务会有极大的获得感和满足感。

我们组织离退休党员同志和社区活动积极分子组建社区治安义务巡逻队。巡逻队的主要职责是在社区内进行防火防盗安全知识宣传和日常治安巡逻。我们一共成立了7个巡逻小队,保障一周七天每天都有巡逻队。平均每人每周参与巡逻4个小时,既不影响个人生活,也能为社区作贡献。(YZ社区工作人员,L102Y)

综上所述,公众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存在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提高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和满足公众共同需求的作用机制。激励公众发挥自身潜能参与基层社区建设,为提高社区综合治理能力,实现社区“善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sup>①</sup>编码代表笔者于2017年10月在南京YZ社区针对社区居民或社区工作人员进行的访谈对象。

#### 四 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培育路径:制度、文化和技术的多重影响

公众参与是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推进社区治理长效发展的有力保障。然而,公众社区参与普遍存在“弱参与”、“搭便车”现象<sup>①</sup>。可以从制度、文化和技术三个方面创造促进公众参与的结构条件,激励公众参与社区治理。

##### (一)发挥积极参与者作用,构建“多元共治”社区治理制度

公众参与有利于基层和公众的关系嵌入,在基层党组织公信力方面实现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社区治理体系应贯彻社区和公众共生共治。第一,充分发挥党员、离退休人员等积极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从参与热情看,党员和离退休人员是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力军。应畅通积极参与者的参与渠道,通过关键群体参与激励社区公众普遍参与。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广泛吸收公众建议和真实诉求,依托基层党组织、基层网格化构建“社区基层党组织—网格党支部—党员网络员—党员楼栋长—党员楼长—公众”信息沟通机制,打通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第三,构建社区规章制度,包括公众议事规则、激励规则、社区公共设施和资源的使用规则,以及非正式制度,如互利互惠规则和惩罚规则。进一步明确不同社区参与主体的职责范围,将公众参与纳入多元共治体系,形成制度化、组织化、标准化的参与渠道和参与协商机制,促进公众和其他社区治理主体在社区公共事务中有效互动与合作。

##### (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文化

公众公共服务满意度体现了社区调度和配置公共资源的能力,应培育公众内生性参与动力,激励公众自发性参与公共服务配置。基于共生视域,培育社区中的互利关系和利他主义公共精神是突破集体主义困境的关键<sup>②</sup>。社区中的利他主义被 Putnam 归纳为包含网络、信任、规范维度的社区社会资本,培育社区社会资本为促进公众形成内生参与动力提供了更具整合性和包容性的“共同体”思路<sup>③</sup>。营造社区治理共同体文化可以加强社区成员的情感联结和内在认同,强化社区社会资本。同时,社区公众在参与行动中由集体记忆所产生的社区认同、群体认同、角色认同又会推动公众持之以恒参与社区公共事务<sup>④</sup>。农村社区基于亲缘和地缘关系凝聚而成的社会网络可以激励村民自发性解决公共问题。面对城市社区的高异质性和社区社会资本的流失,需要探寻一种可行路径营造社区参与文化,引导公众自发参与社区治理。

##### (三)技术赋能降低公众参与的机会成本

公众参与体现了公众维护社区共同利益的需求,应进一步探究如何实现公众利益的诉求表达。社区和公众之间即时的信息传递和反馈可以降低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机会成本,社区中的新媒体信息交流可以加强社区公众沟通和交流的频次,应通过信息技术赋能激励公众积极参与社区治理。一方面,微信、QQ 等信息交流技术可以降低公众内部、社区和公众之间的沟通成本。公众沟通频次的增加进一步促进互动,形成社区社会资本累积<sup>⑤</sup>。另一方面,社区公众号等政务信息公开技术可以为公众提供公开信息,增强公众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关注和了解。此外,社区应进一步探索技术赋能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五社”联动的途径。通过社区政务服务网络化、社区商业服务数字化,提升城市社区智慧化、科技化、便捷化水平,进一步降低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机会成本。

[责任编辑:钟秋波]

<sup>①</sup>徐正、毛佩瑾、赵小平《居民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影响因素》,《城市问题》2015年第7期,第85页。

<sup>②</sup>《人类活动中的理性》,胡怀国、冯科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8—70页。

<sup>③</sup>Robert D. Putnam, “Tuning In, Tuning Out: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 *The Economic Journal* 28, no. 4 (December 1995): 664-683; Docherty, Iain, Robina Goodlad, Ronan Paddison, “Civic Culture, Community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Contrasting Neighbourhoods,” *Urban studies* 38, no. 12 (July 2001): 2225-2250.

<sup>④</sup>颜玉凡、叶南客《认同与参与——城市居民的社区公共文化生活逻辑研究》,《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2期,第147页。

<sup>⑤</sup>陈福平、李荣誉《见“微”知著:社区治理中的新媒体》,《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3期,第170页。